

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

Chinese Culture and Modern Life

韦政通 著

朗
朗
书
房
·
文
化
要
义
丛
书

无论对西方
或是对自己的传统，
采取怀恨
或狂热的态度，
都不是具有
民族自信心的表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

Chinese Culture and Modern Life

韦政通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韦政通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朗朗书房·文化要义丛书)
ISBN 7-300-06681-X

I. 中…
II. 韦…
III. 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6496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水牛出版社授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文化要义丛书

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

韦政通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lm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965×635 毫米 1/16
印 张 11.75 插页 2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114 000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定 价 15.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自序

这是一本尝试以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探讨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若干问题的书,它的目的希望有助于现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重建,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

1972年秋季,我应邀到中国文化学院儿童青少年福利学系讲“人生哲学”的课,这是一个新成立的系,在一次商订全系课程的会议里,决定了一门新课“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系主任熊慧英希望我担任这门课。我直觉地感到这是一个好题目,但也是很难讲的课,因据我所知,以前没有人开过这样的课。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简直不知从何处着手,经过一阵困惑,决定先听听朋友们和有关专家的意见,于是建议《现代学苑月刊》的负责人项退结教授,希望能以刊物的名义,就这个问题举行一次座谈会,并代拟了一份讨论纲要,寄给参加会议的人士参考。纲要共列四点:1.就您研究的专门领域或个人的生活经验,看传统文化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究竟还有哪些重要的影响?在这

些影响中哪些部分是好的？哪些部分是不好的？2.就您研究的专门领域或个人的生活经验，看西方文化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部分是好的？哪些部分是不好的？3.就您研究的专门领域，您认为如何重建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它的标准和内容是什么？4.由于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同时受了中西文化双重的影响，因此，引起某种程度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冲突最主要的是哪些？冲突如何才能克服？这个会于去年7月20日在耕莘文教院举行（会议记录发表于同年9月的《现代学苑》），因时间仓促，部分学者又因趁暑期带学生出去做田野工作，结果出席的人士不足半数。在出席的学者中，以杨国枢教授的发言最精彩，给我不少启发。但就全部发言内容看，我个人并不满意。有了这次的经验，才使我下决心要把这个问题做广泛而深入的思考，我把它当做自己思想工作的一次新挑战。现在写成的这本书，就是过去一年深思的成果。

在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中，最困扰我的问题，是一直把不稳“现代生活”的重心，写了几个月，才发现所写的大部分是“现代思想”，不是“现代生活”，只好停下来重新思考，在许多彻夜难眠的困思中，终于寻找到新的起点，也知道问题是出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许多年来我思考问题是习惯性地接近历史的方法。而这种方法用来写此书是不相应的。相应于此书的性质，需要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知识，这对我来说相当困难，因为这不是我的专长。在这种困难下，我仍有勇气决心一试，是由另一种学习背景促成

的。最近四五年来,我有幸被邀参加一个科际综合性的讨论会,使我有机会长期和一群行为科学家(其中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医学等)从事深细的讨论,引起我学习这些学科知识的强烈兴趣,也使我尝试着用新的方法去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上的一些问题。假如没有这个机缘,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来。

当我重新开始写此书时,遂将前面写成的大部分属于“现代思想”的稿子,冠以另一个书名出版,这就是我的另一本新书《现代化与中国的适应》,真是令人欣喜的意外收获。

我找到的新起点,是以现代生活为一动态坐标,并把传统文化投射到坐标上来,看它在这一动态过程中的影响、反应,以及出现的种种问题。现代中国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生活失调,生活失调导源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冲突中求适应,失调表示原有的生活方式难以适应新处境,于是造成个人解组。当一个社会个人解组的现象逐渐普遍时,就显示它的文化和社会结构,都出了问题,对这些问题地了解与解答,形成全书内容展现的一条主要线索。旧有的生活方式,所以造成适应困难的原因很多,我仅选取家庭主义、道德问题、养育方式、权威性格等与生活层面关系最密切的几个方面,加以陈述和分析,企图借此找出问题的症结,并导出解决的途径与目标。这种工作,因无前例可援,在独立思考中备尝艰辛,因此竭诚希望读者和关心这类问题的专家们,能给予我指教和批评,使我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能有更多的长进。

在这里，必须感谢近年经常和我在一块讨论问题的朋友们，使我在许多夜晚能享受到心智交流的快乐，鼓舞着我继续探求新知的兴趣，此情此景，值得终生感念。此外，要特别谢谢熊慧英教授，如果不是他的盛意，我根本不可能动念写此书。

1974年6月25日 台北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文化冲突与生活失调	(1)
第一节 文化冲突	(3)
第二节 生活失调	(14)
第三节 文化振兴与个人重组	(22)
第二章 家庭与个人	(32)
第一节 家庭主义的特质	(33)
第二节 家庭主义与个人	(37)
第三节 传统家庭的解组	(42)
第四节 认识“个人”	(49)
第五节 现代家庭与个人关系的重组	(53)
第三章 儿童养育	(62)
第一节 社会化	(63)
第二节 传统的养育方式及其影响	(66)
第三节 转变中的儿童教养	(71)

第四章 权威性格	(82)
第一节 权威的概念意义	(83)
第二节 权威性格形成的文化动因	(86)
第三节 权威性格的特征	(94)
第四节 权威性格的改变	(99)
第五章 妇女生活的变迁	(108)
第一节 传统中国的妇女生活	(109)
第二节 清末以来妇女生活的变迁	(118)
第三节 今日妇女问题	(128)
第六章 道德问题	(134)
第一节 道德观念的激变	(135)
第二节 道德的崩溃	(139)
第三节 传统的和现代的	(145)
第四节 道德的困境	(152)
第七章 现代生活的理想	(159)
第一节 适应性和独立性	(160)
第二节 价值均衡	(163)
第三节 约制我族中心主义	(165)
第四节 尊重个性	(167)
第五节 宽容异见	(170)
第六节 道德之勇	(172)
第七节 利他思想	(175)
第八节 重铸自己	(177)

第一章

文化冲突与生活失调

中国近百年的文化演变过程,是一部充满文化冲突的历史,一切的冲突,主要是导源于中西文化的广泛接触。近百年来的文化冲突,与过去文化内部的冲突,以及中印文化接触而产生的冲突,其性质都大不相同。传统文化内部的冲突,著名的有正统和异端之争,有汉学和宋学之争。印度佛教进入中国,虽也与固有文化产生过长期的冲突,但后来也化为正统和异端之争的一部分。汉宋之争,主要争的是:谁足以代表圣教?谁能有效地弘扬圣教?其目的都是为了增强圣教的权威。正统和异端之争,主要是出世和入世之争,或扩大点说,是人文世界与超人文世界之争,其间虽亦有价值的冲突,不过目标不在价值的取代或更新,而是要求并存,所以唐宋以后逐渐变成“三教合一”的局面。这两种规模颇大的冲突,不仅没有影响到圣教的权威,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害,中国文化

的特质在历经种种冲突以后，依然屹立不移。

由中西文化的部分接触演变到全面接触，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第一，中国自汉以来，就与西方有接触，但 19 世纪中叶以前，始终只限于零星的交往，西方文化的任何一方面，都没有在中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当 19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文化入侵时，中国对西方是极端地陌生。

第二，19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人来华，一为通商，一为传教。西方大量工业产品的流入，促使传统手工业崩溃，手工业的崩溃剥夺了中国农民三分之一的经济收益，因此导致农村的瘫痪，引起普遍的生活不安。西方宗教的入侵，无异是向传统的圣教挑战，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不只是心理的不安，而且是无比的敌意和仇视。前者是生存之争，后者是文化命脉之争。生活的不安和心理的敌意，已为中西之间的种种冲突做好戒备，一遇导火线，冲突便立刻爆发。清末的无数教案和后来历久的中西文化之争，都不难从这里了解到它们社会、文化的部分背景。

第三，西方由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以及 19 世纪中叶以后向外的扩张，为人类展现了一个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势将促成全人类的文化革命和变迁，引起的剧烈巨变，绝不亚于人类的出现和从原始跨入文明的前两大转变^①。面临此巨变，所有的传统都要经过一次全面的更新和创新的过程，即现代化，才能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没有一个非西方的国家，在与西方接触之始，就能认清这一点的，因此文化冲突势不可免。

百年来的文化冲突,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生活的严重失调;生活的失调,又更加强文化冲突。二者的交互影响,是当代中国人痛苦的根源,也是中国文化再生付出的代价。

第一节 文化冲突

在西方文化向外扩展的过程中,任何非西方社会接受西方文化,冲突虽不可免,但冲突的幅度有大小,冲突的时间有久暂。在中国引起的冲突,既大且久,传统方面必有其特殊的原因,下面先从冲突的现象来看。

一、冲突举例

由中西文化接触而产生的文化冲突,例子太多了,下面提出几个著名的选样。

教案 教案是因西方教士(包括新教与旧教)与中国官绅、乡民之间的冲突所造成,这是19世纪中叶前后在中国社会发生次数最多、波及地区最广的冲突。明清之际,天主教就在中国传教,康熙四十三年(1704),在华教士因奉行教皇禁令,禁止信徒敬祖、祀孔、祭天,次年,康熙遂下诏实施教禁,此后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中断了140年。直至1844年,根据中美《望厦条约》及中法《黄埔条约》,西方教士可在五个通商口岸设立礼拜堂,道光帝并应允西人要求,颁布敕令,准许中国人民自由信奉洋教,从此

教禁大开。英法联军之役,又订了《天津条约》(1858)和《北京条约》(1860),《天津条约》规定教士可进入内地传教,官厅且须力加保护,教民不得受歧视。《北京条约》规定教会可享受在内地置产的权利。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在领事裁判权方面,又规定了会审制度,于是教案发生后,当中国官厅审判时,外国可派员会审,会审时,常制造借口,横加干涉。以上条约中所订的种种特权,是酿成到处发生教案的部分原因。此外,教案的发生,有导源于风俗民情不同者:如天主教会,在中国普设育婴堂,这本是社会慈善事业,可是中国民间对这类机构的性质缺乏认识,遂被利用作为发泄仇洋心理的借口,再加传统炼丹术、房中术可资附会,于是出于善意的慈善事业,竟被反教文字渲染成“拐骗男女幼童,取其精髓,造作药丸”、“采阴补阳”等罪行^②,1862年的南京教案、1868年的扬州教案、1870年的天津教案、1891年长江流域的教案、1895年的成都教案,皆起因于士民对育婴堂的误解^③。有导源于礼俗不同者:中国是重视礼教的国家,尤其是礼教中的敬祖、祀孔、祭天,更被中国人视为天经地义,西方教会禁止教民奉祀,破坏风教,败坏人心,莫此为甚,自然引起卫道之士的仇恨,因此利用种种借口,激励民愤,群起而攻。教堂做弥撒,男女夹杂不分的现象,就常被利用做借口,加上恶意的悬测,而酿成多次教案^④。

西方近代文明,带来人类的巨变,非西方国家面对巨变,可能产生三种不同的态度:狂热地、无批评地接受;谨慎地、批评地接受;怀恨地接受^⑤。东南亚的一部分国家如

新加坡、菲律宾,比较接近第一种态度。第二种是最理想的态度,但例子罕见。中国数千年的闭关自守,是被西方人的大炮轰开来的,西方人到中国来的见面礼,却是一次又一次的不平等条约,凭着优势的武力和条约特权,经济侵略、宗教侵略双管齐下,前者加深了中国的贫穷和不安,后者制造出无数教民冲突事件,中国又不得不顺应此一巨变,于是被迫采取了第三种态度。包林(Kenneth E. Boulding)说:“这种怀恨地接受的态度,是最要不得的,最有可能招致重大的灾祸。”^⑥中国近百年史,完全证实了这话的真实性。了解19世纪中叶中西冲突真相的人,就会知道中国实无其他选择的可能。一切“灾祸”中最大的,是由于怀恨造成的勉强接受西化的态度,使我们一直只愿接受西方文化的成果,而不甘心接受产生成果的来源,这些来源包括西方的现代意理、方法、纯知精神和智慧。在这里,不难了解,为什么张之洞等人“中体西用”之说,历经大半个世纪,仍阴魂不散的真正原因。

维新变法 在19世纪后期,由中西文化接触引发的另一次文化冲突,是维新变法运动。教案是中国官绅、乡民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冲突;维新运动则是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维新之士与保守人物之间爆发的一场冲突。

维新运动乃由当时内外情势交逼而成。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之战,结果中国一败涂地,一个蕞尔岛国,竟能击败庞大的文明帝国,当时朝野受到的震惊,远超过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的失败。甲午之败,更进一步暴露了清廷的愚弱,因此,从1895年到1898年维新运动的短短几年间,

引起列强对中国的疯狂侵略；胶州湾、旅顺、大连、广州湾、威海卫、九龙半岛，相继被割，到1897年，终于有瓜分中国的运动，到这时候，懵懂自欺的朝臣，也不由得不感到亡国的危机已迫在眉睫。不知死活的清廷，在同一时期，竟在酝酿“后党”（慈禧）与“帝党”（光绪）之间的一场母子冲突的大悲剧。这内外的情势，造成产生维新运动的有利环境。^⑦

维新运动的领袖是康有为，其时康氏刚中进士不久，是科第中的新贵，由于这一出身，才使他能掌握时机，从事中国近代史上首度的政治革新，揭开中国民主运动的序幕。康氏变法的目标，是希望把大清帝国改变成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观念和策略，由于文字的隔阂，无法直接采借于老牌君主立宪的英国，而是借鉴于日本的明治维新。1898年正月，在应诏陈言统筹全局的一个奏折里，他告诉光绪，日本维新的要义有三：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对策所以征贤才；开制度局而定宪法。^⑧这三点就是维新变法的蓝本。为了顾及国情，也是为了减少士大夫们可能因疑惧而形成的阻力，他利用传统“托古改制”之说，援引公羊家“张三世”（据乱、升平、太平）的进化思想，作为实现君主立宪政治的理论依据。尽管康氏设想周详，终因立宪政治与中国德治主义的传统政治原理有极大的差距，与当时已流行的“中体西用”的意理也不相合，因此，新旧政治思想之间的冲突，仍不能免。这一点，陈铨在《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一文中，分析得很清楚：

内容上,康之虽尊孔子,而借孔子改制倡民权平等之说,此为其思想中最重要之部分。民权平等与三纲五常之说,有根本之冲突,而纲常伦纪,即中学为体者德治主义之基础。故不同一。

方法上,康、梁主从革行一切制度着手,虽未尝抹杀人治,但倾向于制度改革,具体设施者多,而不在高言道德教化之论。由德治者之观点视之,则其治国之方,但知有法,尤为西法,而非重德化之人心。故不同二。

目的上,康有为虽用公羊学说,以大同世界为政治之鹄的,但康自言眼前之中国,不能谈王道,惟须讲富强,故在主德治者认为,康之目的只在富强,而富强者初非治国之最后目的。此不同三。

程度上,康、梁虽未抹杀中国固有之一切,而就其大变急变之态度,则几乎将西法为主,以中法为辅,即法治为主,德治为辅,与中体西用又相反。此不同四。^⑨

维新失败的原因很多,新旧政治思想的冲突,只是其中之一端,因此处只就文化冲突说,其他的原因可暂不涉及。

反儒家运动 民初的反儒家运动,反映出新(西化)旧(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这是中西之间诸多冲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影响也最深远。这次冲突直接导因于袁世凯的帝制运动。袁氏称帝,利用孔教做护身符,使反儒家运动的领袖们认定儒家与专制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为了使帝制

活剧在民国史上不再出现,就必须消灭它的历史依据,因此由反帝制而转为抨孔。1916年,因袁氏倒毙,结束了洪宪帝梦,抨孔浪潮却乘势汹涌澎湃,历久不衰,引起广大知识青年的共鸣。

抨孔运动所以能顺利推展,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利用了最有力的武器: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虽是由西方文化接纳而来,但到了民国初年,这两个目标,已渐成为国人希望所寄,反对它的人,就要被视为思想顽固和专制余孽,何况那些旧式士人,因对民主、科学了无所知,纵然有卫道之心,也是有气无力。抨孔运动的胜利,虽博得年轻知识分子的欢呼,但因抨孔不是采取理智的批判态度,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终为以后中国半世纪埋下思想纷争的种子。

抨孔运动的领导人是陈独秀,他把仇视帝制的心理,转过来与孔教为敌。同时他是新文化最有力的倡导者,他对西方文化又是采取狂热的、无条件的接受态度。这两种心理的结合,使陈氏一下子就把中国传统的旧文化和西方来的新文化,劈成两截,视新旧之间,绝不能相容。他说:“欧美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⑩又说:“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⑪如此中西文化观,不可避免地会导出下列的思想和影响:

1. 既然西方文化与固有文化之间,如此相反而不能并容,那么中国文化的出路只有一条,即“全盘西化”。尽管